



大学发展研究

2016年第3期(总第10期)

甘肃中医药大学发展规划处 编

2016年11月22日

目 录

一流之道

一流之道	/1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4
带着中国底色影响世界	/8

改革动态

加强院校研究 促进高校发展	/10
大学应重构科研与教学关系	/12
“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专家谈” 创新	
人才培养:澄清误区才能明辨方向	/15
创新性教育: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	/18

大学治理

行业特色高校如何吸引来华留学	/19
大数据时代如何办出大学特色	/22
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个路径	/24
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为何出现偏差	/26

医苑广角

中医药高等教育特色发展路径何在?	/30
------------------	-----

一流之道

——苏州大学的探索

不在省会城市，不是部属高校，对一所大学来说，似乎意味着“先天不足”；在这样一所大学里，谈论“双一流”话题也似乎缺少些“底气”。

不过且慢，请看数据：“2016 自然指数”排行榜上，该校位列全球高校排名 78 位；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数据显示，该校 7 个学科跻身全球前 1%……

这就是有着 116 年历史的苏州大学。其探索创新、追求卓越的一流之道，让人着迷。

育人之道：多样供给 因材施教

自学 IOS 开发语言、独立研发 APP 游戏，申请到苹果公司的特别奖学金，受邀参加在硅谷举办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经历，最近落在了苏州大学敬文书院大二学生左辰豪的身上。

左辰豪的幸运，折射出苏州大学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改革创新。

2011 年，借鉴国外著名高校的“住宿学院制”，苏州大学从各学院中选拔了一批不同学科专业的新生入住敬文书院。几年来，在以学生自治为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和以研究为导向的学习模式下，书院逐渐成为学生思维碰撞、激发创意的“第二课堂”。

“书院实施全程全员导师制，在课程学习、科研项目、生涯规划、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学生切实有效的指导。同时，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的宿舍文化，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聊起自己的成长环境，左辰豪感受深刻。

在苏州大学，学生有各种机会参与科研活动。

作为 17 所国家试点学院之一的苏州大学纳米科学技术学院，每名本科生从大一起就能进入实验室参与纳米领域最前沿的科研课题，经过“专属”导师的专业培训后，还能直接操作使用学院总价值超过 1 亿元的实验平台设备。

而在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通过学院搭建的国际化教育平台，走出国门拓展国际视野。2013 年以来，该学院已有 45 名本科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的资助，赴国外高校进行为期 10 个月以上的交流学习。仅今年上

半年，学院就有 26 名学生收到了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的预录取通知。

苏州大学教务部部长周毅介绍说，近年来，学校不断完善教学模式、课程建设与课程考核形式，实施了新生研讨课、微课、翻转课堂、课程过程化考核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并通过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等各类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多措并举推进本科生教育改革进展。

学科之道：强强联手 协同创新

近日，一场有关抗肿瘤药物研发的跨组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4 个多小时的交流中，血液学研究中心教授何苏丹课题组与药学院教授张小虎课题组围坐一起，汇报各自研究进展、分析讨论实验数据，共同制定课题研究下一步计划。

像这样的联合组会，是两个课题组之间的一项常规活动。何苏丹说，正是在交叉协作的联合攻关中，加速了高效新型抗肿瘤小分子化合物的研发。

为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集成，学校相继建设成立了如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机器人与微系统研究中心等一批交叉学科研究基地。“学校集中资源精准发力，打破学院（部）界限和学科壁垒，由此带动形成的优势学科集群，大力推进了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苏州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沈明荣说。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苏州大学人才高地的集聚效应中也有体现。2007 年以来，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该校先后引进包括院士、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等各类优秀人才 1300 余名。

面对新兴学科不断“出新”，学校一些传统学科也在整合资源、借助外力，寻求“重生”。

2007 年，苏州大学成立首个校企合作学院——金螳螂建筑学院，秉承江南古典园林意蕴与苏州香山匠人精神，学院在规划凝练学科方向时，将“风景园林”列为特色学科，既兼顾原有农学特色，又偏重植物应用与设计，扩展了建筑学科的内涵。

凭借校企共建优势，苏州大学将室内设计方向列为建筑学科的另一着力发展方向，并邀请富有一线实践经验的设计师担任课外指导，带领学生做调研、画图纸、建模型、下工地。匠心筑品，是他们对“工匠精神”的解读。

科研之道：校地合作 顶天立地

仔细研究苏州大学在大学排行榜上的表现，记者发现，那些科研大牛身后的学科领域，都是苏州乃至长三角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发展急需。

紧跟苏州市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脚步，苏州大学在 2009 年全新组建能源学院。很快，学校的“大动作”引起国内光伏产业龙头企业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的注意，企业先后投入 550 万元与学校共建阿特斯光伏研究院。

去年，该校物理与光电·能源学部教授苏晓东的研究成果“低成本湿法纳米黑硅电池技术”，在集团成功实现规模化生产，研发的电池平均光电转化效率超过了现有生产线常规电池效率 0.3%—0.5%，并实现了过亿元的销售额。

谈起科研成果顺利走出实验室投入生产线，苏晓东感慨万分：“这得益于强有力的学科团队支撑，更离不开校地、校企间紧密的产学研合作。”

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转化通道。为此，苏州大学提出“顶天立地”的科技发展战略，让科研创新与产业服务全面结合。学校将研究院搬到地方，以区域产业发展重点为核心，先后派出 57 位“科技镇长团”骨干负责校地科技对接，500 余位教师进企业承担近千项横向科研项目。

2011 年，乘融合发展之东风，苏州大学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成立“东吴智库”，围绕苏州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充分发挥智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智囊团作用。智库先后提出几十篇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苏大方案”，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参照。

孕育于苏州这片热土，苏州大学将学校的学科专业、人才科研与城市共生共融。“十二五”期间，学校适时调整本科专业设置与布局，新增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 17 个本科专业，强化专业的社会服务职能，还提出“创新在苏大、创业在苏州”的人才共享理念。在高校创新链与区域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中，形成了“名城带名校、名校促名城”的互动发展新格局。

“一流之道，在于追求卓越。学校紧密追踪国际科技前沿、着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精准服务国家区域建设，并把这些理念和成果全程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每一个环节。”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说。

（《中国教育报》2016 年 10 月 08 日 作者：姚臻 丁姗 储召生）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报告提纲在网上流传，报告不仅提出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并指出今后 5-10 年，是成为一所伟大学校的关键时期。报告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许多网友为北大的理想喝彩，也有网友疑惑地问，“5-10 年建成，成为一所伟大学校是砌墙吗？”那么，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伟大”和一般理解的“世界一流”不是同一个概念

从词义上来看，“世界一流”是个分级概念，就是把同一种类型的事物分成若干个级别：一流、二流、n 流；要分级就需要对不同的个体进行比较，就需要标准和各种指标，就需要计算，多一分排在前面，少一分排在后面，非常清晰，所以“世界一流”几乎是若干标准和变量的聚合体，可以被比较，可以被测量。这也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人们目前理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由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规定的。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说的那样，“对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来说，跻身排行榜前列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证据。”显然，与“世界一流”相比，“伟大”是一个更模糊也更具有精神气质的词语。“伟大”很难被测量，很难被比较和分级。它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用在大学上，“伟大”更多的不是指事功，而是指精神气质。总而言之，“一流”是标准，“伟大”在于品格。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在许多中国知识人的眼里，1919 年的北大已经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尽管她那时候年轻，只有 21 岁；规模小，只有大约 2000 名学生；设备简陋，没有几个像样的实验室；更谈不上在教学科研上处于世界前沿。与同时代的欧美大学相比，她显然不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但她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她拥有特别的精神气质，她提出的“民主”“科学”引领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感召了近百年来来的中国大学。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与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相比，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在中国的名气并不那么大，在 2016 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被排在第 28 位，在她前面还有 20 所美国大学，但她或许比排在她前面的不少美国大学，都更称得上“伟大”。从 1848 年创建之日起，她就明确了州立大学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她提出的“威斯康星理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推动美国大学形成了社会服务这一功能。

荷兰的特文特大学几乎缺乏成为一所好大学的所有条件，她 20 世纪 60 年代才成立，地处偏僻的乡村，经费缺乏，规模小，到现在学生也不过 1 万人。或许正是恶劣的环境赋予了她变革的意识，她用创新的理念运行大学，成了欧洲创业型大学的典范。与一些大型综合性大学相比，特文特大学的规模太小了，很难成为各类排行榜的宠儿，但没有人参观这所大学后，不认为她是一所伟大的大学。

不仅是中国、美国、荷兰这样的国家，不少中小国家，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不少伟大的大学。这些大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就具体成就而言，她们一般都能满足以下两项条件中的一项或两项：或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和民族进步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或是在高等教育的理念发展、模式创新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她们的贡献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她们一般都有着超越性的理想，并能以一种纯粹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践行理想。她们的成就，往往是理想主义照耀的产物。她们有的看上去是特立独行的，却不会因为任何其他诱惑背离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些大学，可以是目前大学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可以不是，但在人们的心中，她们就是伟大的大学。

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可以建成，伟大的大学只能靠涵养

现在，我国高校正在积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在这一进程中，很多人将其理解为建设排行榜意义上的一流大学，认为它是各种定量指标堆砌的产物。事实上，各大排行榜使用的一些主要指标，比如教师学生规模、顶级刊物、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引用率、论文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的数量等等，这些都是量化指标。什么东西只要一经量化，基本上就可以购买，就像氧气和水。自然界的氧气和水是免费的，也是无价的，但一经装到瓶子里，就被量化，就可以购买。学术也是如此，一旦变成 GDP，被量化，就可以被购买。上述指标，都可以通过花钱引进科学家、培养发文专业户来提升。从这个意义

上，排行榜上的一流确实是可以像砌墙一样砌起来，只要你肯花成本。

但是“伟大”不行，“伟大”没有办法量化，没有办法购买，所以也没有办法靠堆砌而成。“排行榜上的一流”可以使用现代的营销手段，“伟大”只能靠口碑。“排行榜上的一流”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标准和脚步，迎合各类的排行榜；“伟大”却绝不跟风随同，有时甚至要逆势而行；“排行榜上的一流”往往是繁华的，而伟大的大学有时却要忍受寂寞；因为是按照一定的指标评价，“排行榜上的一流”常常是标准化的，属于同一种模式和类型，但伟大不同，伟大的大学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总是有着自己的特色。

“伟大”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学术抱负和人类良知，只能靠涵养而成。涵养和建设不同的是，涵养没法规划，没法设立阶段性目标和各种推进工程。涵养是让一所大学处于一种像树一样的自然生长状态，只需要选择合适的种子，提供合适的土壤、阳光和水，她就会自由地生长。

片面追逐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让有的大学离“伟大”越来越远

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在一个崇尚科学和知识的全球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通过对一些学术卓越大学的共同点进行揭示，来为其他大学提供标杆和学习的典型，对推进人类社会高等教育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实际情况是，当今世界对“世界一流”的追逐已陷入对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的片面追逐，让有的大学离“伟大”越来越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各种各样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正在吞噬“伟大的大学”。

在评价“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应运而生，这些排行榜对大学甚至对不少国家的高等教育，影响都是巨大的，带来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调整和合并。以法国为例。在 2003 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法国居然没有一所大学能跻身前 50，这对素来为传统骄傲的法国高等教育界是当头一棒。为了在这类排行上获得更好的成绩，法国政府加快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建立高等教育研究集群或联合大学。也就是法国在研究世界大学排名后，发现大学规模小、专门化程度高是个很大的劣势，因而以研究集群或联合大学的方式对原有的一些教学科研机构进行整合。研究集群/联合大学之间的合作有的密切有的松散，但有个要求是一致的，就是各成员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发表文章都要加上研究集群/联合大学的名义。从

2007年推动以来，到2013年法国已经成立了23个这样的联合体。最有名的包括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化学学院、居里研究院、巴黎多芬大学、巴黎天文台等十家机构组成的巴黎科学与文学联合大学。排行榜的威力如此巨大，真是让人不胜唏嘘。这样整合后的排名增长，不知与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实际增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排行榜对中国不少大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大学在学科建设上，自觉地以此为指挥棒。对那些具有“排行榜生产力”、有利于提高自己名次的学科高度重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罔顾自己的学科传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一些不具有“排行榜生产力”的基础学科和小学科常常受到冷遇。在人才评价与考核上，也是如此，一些大学片面重视科研发表和论文的引用率，许多教师也因此沦落为“排行榜生产力”的“包身工”，不再能享受到教书育人的乐趣。在最近《光明日报》发表的《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使大学深处危机》一文中，作者认为“全球大学排行榜和科研评估体系极大地狭隘化了大学的传统使命，绑架了院校个性化发展的机会，粗暴地掀起了知识量产、校际攀比，甚至国际竞争运动”，因而扭曲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宗旨，直接导致了教学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边缘化。

对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片面追逐，在相当程度上催化了大学校园里的浮躁。我们在对如何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竞争力这一主题进行访谈时，不少学者对当前中国一些高校的环境和学风表示忧虑。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面临的思想生产条件应该是晚清以来最好的，但是人的心态的浮躁程度好像是晚清以来最差的。精神状态和物质满足好像成为一种矛盾。”以这样的方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容易就离“伟大”越来越远。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涵养“伟大的品格”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具有高水平高等教育的体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一个知识时代，应该也有能力建设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切不可将其简单等同于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政府在历次的重点建设和去年的“两个一流”建设文件上，都反复强调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强调要对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就是指我国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既有学术生产力，又能在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文化进步上发挥引领作用的有自己品格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有着自己的高格调和精神气质，而不是成为被各种排行榜绑架的缺乏灵魂的指标堆砌物。

所以，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仅是在各项学术指标上有着卓越表现的大学，而且是同时善于涵养“伟大品格”的大学。在追求学术卓越的同时，她们有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纯粹的学术抱负；她们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更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和人类良知的捍卫者。她们的目标不是成为各类排行榜上的座上客，而是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丰碑。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伟大的大学”。

（《光明日报》2016年09月20日13版 作者：胡娟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

带着中国底色影响世界

——北大燕京学堂的探索

燕京学堂作为北京大学中的一个“特殊存在”，探索了如何通过与国际接轨的全英文授课、全额奖学金制度在全球吸引顶尖人才。同时，这一“特殊存在”也承载着对“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中国高校面临的迫切课题的探索。

一流大学要站在学科交叉前沿

当今世界，全球化作为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对于教育的影响是深刻的，它直接促成了教育的国际化。为了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各国开始着手从全球大背景出发来整体设计课程体系，组织和分配知识结构，建构具有世界水平的课程。

北大创设燕京学堂，正是因为深刻地认识到当代科学的发展和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越来越依赖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如果想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就必须发展交叉学科。2006年，北大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立足于理科、工科、医科等领域的交叉学科实体，开展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和培养交叉学科的优秀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然而，北大的人文、社科学科具有百余年的历史积淀、悠久的学术传承、厚重的思想根基、浓郁的学术氛围，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它们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同样意义重

大。

开设“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促进人文、社科领域的前沿、交叉研究，这是燕京学堂创立的初衷。“跨学科培养是我们的主旨之一。”燕京学堂办公室主任姜国华说。据他介绍，燕京学堂的中国学硕士项目下设六个方向：政治与国际关系、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哲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历史与考古。各方向的学生均需从7门核心课中国学导论、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的伦理与价值、变革中的中国、中国社会、中国艺术史中选取4门。另外，还有语言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实地调研以及独立研究。同时，学生还可以去选修其他学院开设的英文授课课程。

一流大学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扩大，中国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然而，无论是西方大学里东亚研究范畴的中国研究，还是传统的“汉学”，或是由政界、军界、情报界、政策智库和媒体人出身的中国观察家开展的“评论式”中国问题研究，相对于中国文明整体，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缺乏整体的观察和研究，因此不太可能带来对中国文化、文明、经济与社会全面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些研究的现实相关性。

然而，未来的世界将是不同文明进一步交流、共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将是一个竞争过程，包括道路竞争、理论竞争、制度竞争，而其根本是文化竞争。中国的大学，必须在中国文化竞争力上有所作为。

从学术上讲，燕京学堂以“中国学”学术研究牵引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究，是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必要工作。

同时，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传承，有着优秀的内涵。用现代的研究范式提炼出这些内涵，用国际化和学术化的语言传播这些内涵，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经济繁荣但又动荡不断的世界上发挥正面引领的作用，是中国大学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北大燕京学堂将学生比例确定为65%的国际学生、35%的国内学生，采用住宿式学院的方式，恰恰为中外学生一起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了解彼此的文化心理和世界观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留学生是文化交流的“大使”。可以期许的是，经过一年共同的学习、生活，交流、理解，燕京学堂的学生们无论是留在北大或是到其他高校深造，还是回到本国服务，当

未来他们进入学术界、企业界、政界或其他各领域服务的时候，他们都将带着中国的“底色”，为世界的概念注入中国元素。

（《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2日 06版 作者：王庆环）

加强院校研究 促进高校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对全国本科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对高教研究机构的基本状况、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机构转型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如何有效发挥全国514个研究机构、4578名研究人员这样一支庞大队伍的功能与作用，促进高校的改革发展，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

高校领导应重视院校研究

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肩负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目标任务繁重，组织结构复杂。加上每所大学的学科结构、人员结构、历史传统、校园文化都存在差异，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同，因而每一项工作都不可能照搬别人，需要创造。大学不仅研究自然、社会和人，而且要研究大学自身。院校研究正是立足本校，通过对本校管理实践问题系统和科学的分析，以提高本校管理决策水平的研究。

随着外部环境、组织自身、决策主体、决策目标等日益多元化与复杂化，高校需要科学决策。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问题，有限的决策实践与资源，多元的决策对象与目标，对决策质量与效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高校决策咨询是一种以信息、知识为基础的智力服务，不仅需要通过收集、整理获取信息，而且需要通过挖掘、分析进行信息处理。校领导充分发挥院校研究机构的数据信息服务职能和决策咨询服务职能，才能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

院校研究和大学领导的关系，犹如汽车表盘和驾驶员的关系。没有汽车表盘，驾驶员无法开车。同样，没有院校研究提供的各种有效数据和决策支持，学校领导无法决策和有效工作。诚如调查报告所提出的，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院校研究，并从整合研究力量、建立相应的机构、配备得力的研究人员等方面加强院校研究。

培养专业的院校研究人员

调查报告指出，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建立高教研究机构，目的在于加强对高校自身的研究。但由于办学自主权和社会问责的缺失等原因，我国高教研究走上了一条学术研究之路，而忽视了对大学自身实际问题的研究，研究人员也缺乏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能力。因此，培养专业的院校研究人员十分重要。

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学研究生的培养。我国有众多的高等教育学及相关学科的学位点，研究生培养应调整培养目标，注重对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与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加大专业教育博士的培养力度。一批理论水平高，懂教育规律，实践能力强的研究生进入院校研究机构，能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

采取多种方式培训院校研究人员。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帮助他们转变观念，掌握方法，适应院校研究需要；管理研究与管理咨询相结合，提高研究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研讨会与研讨班相结合，鼓励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为院校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高教研究机构向院校研究机构的转型，需要良好的条件和制度环境的保障。政府、社会、高校应共同努力，创设相应的环境和条件。

要完善社会问责制度，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领导对院校研究的需求。现在，虽然对高校谁都可以提出批评、指责，但高校对这些可听，也可置之不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高校虽然有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但还很不充分。这些都影响高校领导对院校研究的需求，制约院校研究的开展。

加强高校综合数据系统建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缺失，是制约院校研究开展的重要因素。推动建立专题数据库、区域数据库，加强国家高校综合数据系统建设，并推进其向社会开放，这些工作对院校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健全校内决策的制度机制，将教育家办学落到实处。现在，政府提出了教育家办学，但只是一种倡导，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今后，在选拔高校主要领导时，要将懂教育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对高校领导的考核、晋升，要将对教育的理解程度，对教育研究的重视程度作为重要标准。在职期间，加强培训，引导他们自觉学习、研究教育理论，重视院校研究和决策咨询。

（《光明日报》2016 年 03 月 17 日 15 版 作者：实言）

大学应重构科研与教学关系

高等院校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科技创新和培养人才的双重责任。高校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高校在制度设计上，要破除制约大学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重新思考大学教师职业活动的评价标准，将科研与教学的有机融合纳入大学教师的聘任、发展与评价体系之中。

大学应重构科研与教学关系

新学期浙江农林大学的教师将课堂搬到科研实验室。

教学与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基本职能。从理论上讲，二者应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机统一于大学教师的职业活动之中，但实际上它们却经常表现为对立。关于二者的关系人们争论已久，国内外相关著述不计其数，但至今仍未有定论。

20世纪50年代，围绕这个问题，我国教育界也曾经引发过一场大的争论。到70年代末，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认为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一个教师的水平应该体现在既能搞科研，又能搞教学。钱伟长院士曾经说过：“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

不过，20世纪后期，由于教师们承担了过多的科研任务，教学受到了挤压。尤其是近年来，在高校的职称评聘、考核评价等工作中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教学在大学中的地位被弱化，有的教师把教学任务当成了额外负担，不愿意在教学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对上课敷衍了事。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主张高等教育应该更加注重教学的呼声似乎越来越高。

改变职称评定主要与科研挂钩的倾向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发挥考核评价政策的“指挥棒”作用，健全教学激励约束机制，克服教学成果难以量化评价的困境，改变职称评定主要与科研挂钩的倾向，提高教师教学业绩在绩效分配、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充分调动教师投身于教学的积极性。

今天大学的改革当然应该正视存在的问题、回应社会的呼声，重新审视教学与科研

的关系。

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要搞好教学。是否重视教学反映了一个教师对自身所从事职业的态度。现代大学作为教学机构，应以教学为中心。教学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职业取向，重视教学是教师职业伦理规范的要求。

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组织和学术机构，还担负着生产和创造知识的重要使命，这必然要强化科研，科研职能是大学的根本价值所在。重视教学并不意味着忽视科研，恰恰相反，要做好教学就一定要搞好科研。能否取得以及取得怎样的科研成果反映了一个教师的学术水平的高低，进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一个教师的能力往往被认为是由科研决定的。

19 世纪初，德国的教育改革家洪堡提出，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大学教师只有在教学活动中不断纳入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其教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学。

美国当代学者伯顿·克拉克曾说过：“现代大学教育中，没有任何问题比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更为根本，也没有任何问题在学术界内外有如此肤浅的想法和倒退性的批评。”的确，我们需要对那些以重视教学为名而忽视科研的论调要保持警惕。

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述，高校教师进行科研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搞好教学。在这一点上，不能本末倒置。

教师做科研能帮助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

大学教师在其特定的专业领域成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者和研究者，能够帮助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帮助学生获取隐藏在各种知识背后的智慧，引导学生展开对可能性的想象，获得意想不到的洞见；培养思考、分析和探求真理的综合能力，成为创新型人才。

首先，大学教师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哲学家罗素就指出，学习并不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著名学府之所以成为学生们的目标，是因为这里有创造知识的大师。大学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次，还要拓展到更高的层次，正如我国学者刘献君等所总结的，教师要“展示理论如何用于实践、开启学生对概念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感知”，还要“从不同的视角探索理解方式、改变学生的思想认识等”。要做到这一点，教师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几十年前，拥有一定自然科学或社会科

学知识的人都被视为人才，都可在知识普遍缺乏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单纯拥有知识并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社会需要的是勇于迎接挑战的创新型人才。因此，为社会输送创新型人才成为当代大学的使命。这就给教师的教学乃至教师的能力结构和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师的科研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教育价值，教师所从事的科研大多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多着眼于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学科本身完善化的需要。应用研究多着眼于现实的社会需要，包括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的需要、环境的需要、医疗卫生的需要以及文化的需要等。科研的过程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是对许多基础问题认识深化的过程。

如果教师不做科研，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体验，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即使投入再多的时间、再多的精力恐怕也难以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

最后，重视科研在大学教学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须是研究型大学，以研究作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可避免要以科研水平作为重要依托，要生产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因此，要大力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切不可将科研与教学对立起来。以重视教学为名而忽视科研，不但搞不好教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恐怕也将拉大。

因此，大学的改革要重构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重视科研在大学教学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教学为要，科研为基”成为大学教师职业活动的基本原则。

（《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10版作者：王耀东 山东科技大学教授、教育部社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专家谈” 创新

人才培养:澄清误区才能明辨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步伐明显加快,工作力度空前加大,各级政府强化统筹协调力度,各类学校大力推进课堂教学深度应用、融合创新,社会力量广泛积极参与,形势喜人。但是,也有很多学校的课堂教学尚未真正体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理念、要素、模式和效果。信息技术走进了课堂,但很多老师的观念仍没有转变,信息技术应用不深入,依然停留在以“教”为中心,以知识传授为主,以应试升学为目的的层次。我们必须澄清对教育信息化认识的“误区”,进一步明确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促进教育信息化给教育教学带来“双重革命”。

教育信息化不是用来“摆设”的,而是要拿来应用的

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主要存在以下“误区”:一是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将教育信息化简单地理解为,只要学校把信息化的装备配齐配足就是实现了教育信息化,用不用没关系。这种认识不仅老师有、校长有、甚至一些教育局长也有。这绝不是国家要推进的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不是用来“摆设”的,而是拿来应用的,要运用于教学、教研、教育管理当中。教育信息化的设施设备建起来,老师就一定要“用起来”,校长要带头“用起来”,局长要督促“用起来”,只有“用起来”才能熟练,才谈得上深度融合。

二是为管理而信息化。把教育信息化简单地理解成为了提高管理效率而信息化,将精力放在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OA办公系统、学生管理系统、后勤监管平台等工作上,只是把信息化作为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管理技术来推进。这当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在一定时期这样做甚至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把教育信息化仅仅局限在“管理信息化”是片面的、不够的。教育信息化不是单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也决不仅仅是管理手段。它首先是崭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通过教育信息化的变革,为国家培养大批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个性成长,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三是为应试升学而信息化。就是用教育信息化的手段强化知识传授,“电灌”加“网

灌”，教学方法、模式虽有改变，但目的还是为了“分数”、为了“成绩”、为了升学率！这种信息化无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束缚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这绝不是教育信息化的价值追求和目的，恰恰相反，教育信息化就是要变革传统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打破应试教育的怪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从知识传授为主向能力培养为主转变，从课堂学习为主向多种学习方式转变”。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鼓励学生个性成长，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四是“完全依赖信息化教学会影响传统文化教育”。实际上，恰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为道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广阔的视野，使立德树人、素质教育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语文课的语言文字美、诗词格律美，历史课的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科学课里古今中外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人文情怀等，都可以用教育信息化丰富多彩的形象化、可视化资源，立体式展现、重演和复制；就是体育、音乐、美术同样可以在“深度融合”的教学过程中实现增强体质魄、陶冶情操、提升素养的目标。

此外，还有教育信息化会造成“电脑依赖”、影响视力等“误区”，都是对教育信息化的偏见与无知。

进一步明确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

为破除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误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在调研中发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还不够清晰和明确。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不是单纯地为了管理方便，更不仅仅是为了应试升学，而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个性获得成长、具有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表达和界定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或价值追求，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也符合国际社会关于 21 世纪教育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趋势和需求。

教育信息化虽然实施多年，但在教育教学上的深度融合尚未真正体现它应有的内涵与价值，我们说教育信息化必将带来教育的深刻变革甚至是革命，“变”就是彻底改变以传授知识为主导，以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学为基本范式，以应试升学为目标的传统教学形态，代之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导和目的，以学生自主学习、互动学习、合作学习、

探究学习、教师积极“导学”为基本范式，以立德树人、素质教育为目标的信息化教育教学新模式并成为常态。一句话，让能力培养、个性成长、立德树人、素质教育真正落地、生根。

从国际教育信息化的趋势看，“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着手布局信息化，力图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学生“学习和创新能力”作为适应 21 世纪信息社会“核心素养”的第一位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国际教育信息化的这一趋势。

直面迎接教育信息化的挑战和机遇

把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理解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目标是不是太高？回答是否定的。古人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确切地讲，我们并非要求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创新型人才，但我们应当有这样高远的目标和视野。学生核心素养和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天赋、家庭教育及社会方方面面，但学校无疑是最重要的环节和场所，必须竭尽全力培养学生三个层次的能力：生存能力，包括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抗挫能力等，这是学生将来立足社会所需的基本能力；发展能力，包括思维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往沟通能力等，这是获得发展、不断成长所必需的能力；创新能力，即创造发明的能力，包括探究能力、想象能力和批判能力等。

把“培养人”作为教育信息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教育信息化落实到服务“育人”的根本价值上，是发展教育信息化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当然，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征途上，必须兼顾到不同区域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现实，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统筹谋划、顶层设计、分步实施。

（《中国教育报》2016年10月27日 作者：赵康 广东省教育厅巡视员）

创新性教育：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

创新性教育的优越性

一般认为，教育模式指的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为实现教育目标所建立和实施的系列教育管理制度和方式。不同的教育模式有着不同的着力点和作用点，目前主流模式主要有二：知识性教育和研究性教育。

实践证明，知识性教育模式、研究性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是巨大的。与此同时，两种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也广受关注。知识性教育模式培养效应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而出现教育边际效益递减，研究性教育注重了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但存在着自我封闭而与社会实践互动不够、重视研究过程忽视转化过程等现象。

创新性教育则是建立在知识性教育、研究性教育基础上的新型教育模式，重在激发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创新意识的、思维和潜能，开发转化知识和研究成果的能力和方式，是以帮助学生对知识和成果的开发应用为主要导向的教育方式。

以激发创新力引领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全社会呼唤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所要完成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激发所有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和激发蕴含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身上的创新力，必须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

首先，要把培养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作为重要教育理念。教师的改革创新素质影响着学生的改革创新素质，教师以创新性的劳动，才能激发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生。因此，应把培养和激发创新意识、创新力作为重要的教育理念落实到高等教育教学实践之中，建立健全相关的引导、评价、考核、激励机制和政策。

其次，围绕提升创新力建立健全引导政策、激励保障机制。有统计显示，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成果中，70%诞生于创新研究型大学。公认的一流创新研究型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一流水平的教师队伍特别是相关领域的领军教授，他们不仅享誉高等教育战线，更享誉社会实践相关领域，社会发展中相关领域每临大事总会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二是支持教师队伍在创新实践中勇于大胆假设、认真求证、独立思考、敢于担当的政策保障体系。

再次，应以培养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为导向推进教学改革。把创新素质的培养，创新力的激发摆在重要问题，从培养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多层次着手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在教学大纲上，不仅规定知识的传授点要求，更应突出运用知识的创新点考量。在教学安排上，转变重课堂灌输轻课堂交流、重大班课程轻小班设计、重书本讲述轻问题引领、重应知应会轻兴趣培养、重知识考试轻创新评价等做法，在重视学生主动强化知识积累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培育创新力的教学设计、教学环节和激发创新力的考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要走出从书本到书本的教育自循环格局，有效增加从鲜活的社会实践中探讨相关知识时间。在课程考核上，把运用知识能力、面对问题担当能力、面临质疑抗风险能力、面对挫折意志品质训练和独立思考能力作为考核的重点。

最后，扩大教师遴选与聘用范围，增加实践兼职人员比例。制定相应政策，探索建立专职、兼职、挂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建设途径。在提升专职教师创新素质的同时，鼓励从相关领域创新实践一线聘选兼职、挂职教师，直接参与相关课程的教学与交流。鼓励知名科研机构、工商企业和社会组织命名“知名品牌”教师，与高等学校教师实现创新的互联互通、信誉的相得益彰、经费的特殊支持。

（《光明日报》2016年09月27日14版 作者：王纓 北京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行业特色高校如何吸引来华留学

我国历来重视来华留学生教育。唐朝时期，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多次组织大规模留学团队作为“遣唐使”来我国学习交流，使我国周边出现了“中华文化圈”，大大提升了中华文明广泛认同感。

留学生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因此，关乎国家发展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至关重要。

双一流建设下的“引进来”

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

范管理”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原则,使留学生教育事业呈现出规模持续扩大化、国别不断增多化、专业选择广泛化等新局面,加快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全面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

2015年,我国启动双一流建设方案,来华留学生教育已不再是单纯的汉语言文化教学、专业理论教学,而是一项促进高校国际交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础性工程。因此,高校以深化改革为内生动力加快来华留学生教育改革步伐已是当务之急。

在“双一流”建设新形势下,行业特色型高校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就必须找准定位,充分发挥好自身优势,着重把握好三个维度:一是把来华留学生教育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结合,充分认识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国家发挥大国影响、传播中国文化、构造国际交往桥梁的重要途径,是行业特色型高校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外交战略和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二是把来华留学生教育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为行业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地化和专业化人才支持,力争与优势行业企业“抱团出海”。三是将来华留学生教育与学校自身建设发展相结合,积极推动学校加快国际化进程,实现内涵式发展新突破。

四大 境不容小觑

行业特色型高校在服务和引领行业发展、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来华留学生教育依然是影响大部分行业特色型高校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化水平、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主要因素,四方面问题成燃眉之急。

竞争加剧,“边缘化”风险日益凸显。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中仍占有留学生教育市场的绝对优势,对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形成巨大压力。我国行业特色型高校虽已形成鲜明、稳定的办学类型、学科特点与服务面向,但缺少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文科和艺术类专业,弱化了来华留学生专业选择机会,导致短板效应愈发明显,缺乏竞争力。

重视不够,“功利化”思想仍存。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贡献更多体现在提升学校软实力上,短期效益不够明显,导致各行业特色型高校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缺乏整体思考和系统设计,未将其纳入学校改革发展主渠道和办学主流指标体系。多数高校仅依靠国际教育学院等相对独立单位负责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缺乏互动和延伸,对学校国际化进程的推动和贡献度也大打折扣,来华留学生教育合力亟待形成。

规模偏小,“浅层化”问题突出。形成规模是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先决条件,而

我国大部分行业特色型高校来华留学生规模较小，培养类型相对单一。加之语言类师资缺乏，教师开展留学生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欠缺，课程体系不健全，教材等办学资源有限，来华留学生教育和普通学生教育之间呈现“两张皮”，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陷入“完任务”的怪圈。特别是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办学水平较低、专业特色不突出，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和攻读硕士博士等更高学位的学生、攻读自然学科的学生比例更低，陷入“浅层化”困境。

缺乏协同，“碎片化”问题要重视。各行业特色型高校间缺乏统筹协调，在来华留学生教育市场划分不清晰，造成无谓的竞争，导致资源消耗、教材等办学资源重复建设和浪费，对本不占优势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又添掣肘。此外，部分行业特色型高校与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企业缺乏互动，协同机制未落实到位，导致行业特色型高校依托行业、熟悉行业需求的办学特色和优势被无形削弱。

顺势应变补短板

站在“双一流”建设的新起点，具有深厚行业背景和突出学科优势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准确定位、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找准行业兴奋点进行研判形势、补齐补强短板，成为打造特色鲜明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核心竞争力之关键。

电子信息领域行业特色型高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近年来通过学校优势学科与行业优势企业结合，找准电子信息行业优势企业对大批既熟悉当地语言文化又掌握专业技术的专门人员的现实需求，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探索实施“双优战略”，使学校来华留学生规模由原来的 50 人增至 700 余人，累计培养 3000 余名留学生来校学习汉语和专业课程。贴近行业发展前沿、熟悉行业市场需求是行业特色型高校重要办学优势，该类型高校应重点围绕优势学科专业，结合行业企业海外市场拓展需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与行业企业协同培养来华留学生的新机制，彻底解决留学生专业选择面窄、就业难度大等问题，打造本行业来华留学生教育品牌。

由于地处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还与本地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大学、西安石油大学等行业特色型高校开展校校协同，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实施‘双优’战略，改革电子信息类来华留学生培养体制机制”为依托，探索行业特色型工科院校留学生培养的新型发展模式，推进课程、教材、师资、学生信息等资源共享，建立来华留学生教育联盟，有效解决了招生面窄、汉语师资薄弱等问题。这种寻求各行业特色型高校间的

深度合作，破除了封闭办学的壁垒，也使高校各展所长。

面对教育竞争激烈化、发展全球化、手段信息化等一系列新变化,行业特色型高校制定实施更加有利于来华留学生教育深入推进的有效举措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放 2150 门课程，其中 620 门视频公开课和 1400 门资源共享课向社会免费开放。这种通过“慕课”等在线开放课程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开放，行业特色型高校学科面相对较窄的“短板”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大。以最快速度适应新发展动向，开发推出本行业领域在线开放课程和反转课堂设计，是行业特色型高校在新一轮留学生生源竞争中占得先机之关键。

目前，大部分行业特色型高校关注点更多集中在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和实现经济效益上，而质量高低才是参与竞争的核心指标。因此，行业特色型高校实现从重视规模 and 经济效益，向质量与规模并举、办学层次与人才培养质量并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的更高层面转变，才能打破各种培育模式间的藩篱，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中国教育报》2016 年 8 月 15 日 作者：高新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助理)

大数据时代如何办出大学特色

当今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在这样一种趋势下，我们大学围绕这个如何来办学？我想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提出“特色、合作、协同、共赢”，四个方面来回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

一是“各美其美”，坚持特色发展。大数据时代办学仍然要符合大学规律，要把大学的特色做到最优，做到极致，从而在学校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就北京交通大学而言，120 年前它是作为中国管理和电信教育发祥点，这些年来，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一直成为学校的一大特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交通和电信事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始终抓住了信息和教育、信息技术和交通这个优势和特色在发展。中国高铁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都给了北京交通大学一个很好的机遇。

二是“美人之美”，坚持合作发展。数字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共享。无论是一个国家、区域，还是一所大学，在面临热点难点问题，要想很好的解决它，仅靠一个

单位或一两个专家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作为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其办学理念必须要坚持合作发展。北京交通大学这些年特别注重国际合作、与大企业的合作、科研院所的合作、跟政府的合作。学校所取得的成果，就是和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合作以及对科技成果转化有益的探索。“美人之美”也是合作的重要理念，要在实践中来建设它。

三是“美美与共”，坚持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作为一个理念，能不能合作得好，建立一个协同机制非常重要。以我校的城市轨道交通合作转化为例：城市轨道交通是一个控制系统，它也是复杂的系统，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系统。举一个例子，如果在北京建一条地铁线，按 50 公里来算，30 辆车要覆盖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做出来，要进行室内实验、室外实验，涉及到设计、制造、管理、应用等多个环节。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学校采用了非常好的协同机制。在设计研发阶段，北京交通大学做为责任主体，其他的运营单位、企业、研究院作为辅助；到实验阶段，以北京地铁运营公司为主，他们来牵头；第三个阶段，则以建设单位为主体。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责任主体，这种协同机制建立了利益共享和分担。这个控制系统的开发大概用了 10 年时间，目前在全国 11 个城市近 20 条地铁线上得到很好的应用。而在这之前开设的 28 条地铁线，全都采用先进的国际技术。

四是“天下大同”，实现发展共赢。这种合作理念最后一定是成功，一定是共赢。如果只强调自己的特色，不尊重别人的特点，无法很好的协同就很难实现共赢。在大数据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信息这样一个共享的时代，我们办大学亦同样如此。每所大学都有其特点，大家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最终实现共赢。

其实学校庆祝北京交通大学 120 年华诞，也是总结五所交大近 20 年的实践成果。20 多年来，五所交通大学之间互学互鉴，携手前进，开拓发展，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实现了这种合作共赢的发展。

（《中国教育报》2016 年 10 月 10 日 作者：宁滨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个路径

大学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应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使命。大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探寻十种路径。

课堂教育路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主渠道。必须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教材、进课堂；其次，要不断创新和改革教学模式，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一门受学生喜爱和好评的课；再次，要向学生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性质、属性、内涵、脉络，帮助大学生增强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

宣传引导路径。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学校广播、电视台、报纸、网站等媒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的宣传平台。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平台的作用，讲好学校故事。此外应充分利用学校橱窗、宣传栏、户外广告等手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处处可见。

活动渗透路径。通过辩论、演讲、座谈、讨论等形式，组织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也可通过征文、学术沙龙等形式，使广大师生投入到理论研究中来，进一步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另外还可以开展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活动，如诚信考试、升挂国旗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示范带动路径。作为学校各级领导，必须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作表率、立标杆，成为全校师生的榜样。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教师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学生党员、学生干部是学生中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也是学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素，需要他们带动广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强调的是知行合一，学习的目的在于实践，大学要全力推进实践育人工作，按照中央有关部门规定，把实践环节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学时学分，制度上给予保障。同时抓好专业实习实训。还应积极开展以送文化、科技、卫生下乡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

文化熏陶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校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典型塑造路径。典型塑造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通过鲜活的榜样人物和典型事例可以帮助师生置身具体的情境之中，产生强烈的道德共鸣与价值认同。可以在教师中广泛开展教学、科研、服务中的先进人物评选活动，在学生中也要广泛开展各类先进表彰工作，让先进典型触手可及。与此同时，加大典型的宣传力度。采取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学习宣传，引领师生向身边的优秀人物学习。还要建立学校荣誉体系，将先进评价纳入人才培养的综合考查体系，形成典型塑造感化的长效机制。

志愿服务路径。一是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二是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组织开展各类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三是把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

社会协同路径。社会、家庭都对大学教育产生影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互补互助。我们应邀请家长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同时也要建立与社会的联动机制。开展礼节礼仪教育，使礼节礼仪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此外，充分利用“五四”“七一”“八一”“十一”等节日，以及党史国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日等，举办庄重庄严、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因势利导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

制度保障路径。一所大学能否做到制度健全、依法治校，本身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这需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必须制定大学章程并严格贯彻落实，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构建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制度的权威和公平公正。

（《光明日报》2016年09月13日14版 作者：王金海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为何出现偏差

当前，针对以工程或项目办法、靠行政措施进行高等教育建设，人们有一些争议和批评。笔者最近参与了一个有多位院士和高教领导参与的高教战略咨询研讨会，其间大家对各种扭曲心灵和行为的无穷的行政或事务性应付深表无奈和不安，包括科学家自尊受到伤害的一些审批和财务控制。公家用纳税人钱对教育和科研的支持自然应该受到监控，但不顾教育和科学规律的配置方式及监控手段不仅不会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还可能人为地造成大量的浪费。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针对高教发展的战略措施和政策频出，除被热议的“985”“211”外，还有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2011 协同创新”工程、目前如火如荼进行的“两个一流”建设工程，还有受到争议的新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等等。在人才方面的工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国家级的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杰青”“优青”等在内的一整套人才计划。实际上 10 多年前国家就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不少人很困惑，这个工程的国家级人选是否可算为现在的“千人计划”，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其实，这些叩问并非真想搞清楚其间的关系，而是对某些不管前后衔接关系、不断“翻新”的工程和项目间接地发些牢骚或表示不满。

多年来，一方面可以说国家对高教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和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或看到甚至直接体验到这些年来高教发展中存在的很多奇怪现象，例如对高教改革失去方向的批评，对我们大学做跟班式科研的无奈，对海归人才质量的质疑，以及当前各高校针对“两个一流”对学科大拆大建甚或重新包装的抱怨，等等。作为业内人士和有责任感的公民，大家不仅为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未能获得应有的成效而造成的直接浪费感到遗憾，更对高校大量的高阶科教人才资源间接地被浪费而感到痛心。例如，很多高校领导和管理者明知有些工作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为了获得资源或得到支持无奈地努力着；很多大教授甚或院士不是深入一线教学和研究，而是奔走在各种评估或“跑关系”的活动中；很多教师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而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和填报各种表格、参加很多会议和活动，而且当事人对这些活动背离主业心知肚明，但又非常无奈地陷入其中。目前高教系统这种日益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扭曲了教育和科学发展的生态，与国家的意图和愿望明显偏离。

到底是什么让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渐行渐远？笔者认为，除依法治教和大学管理的体制问题外，关键是我们一直在用工程或项目的方式配置资源、以行政的手段来导向和操控教育和科学活动，违背了教育与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行政化的工程或项目配置机制违背了教育与科学的基本规律

通常，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也接受市场机制（学术竞争）和行政机制的引导。但不同的机制对教育和科学发展有截然不同的影响。例如，我们试图通过各种工程培育出一些杰出人才，用意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的诞生往往不是多方面提着水壶能浇出来的，而是在良好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环境下冒出来的。因此，真正的人才计划或政策应该是营造这种机制、文化和环境，而不是简单地选苗助长或拔苗助长。纵然，通过各种工程的“浇灌”也可能促成一些人才的出现，但却会因为环境的浮躁与恶化抑制了大量优质甚至杰出人才的涌现，这种忽视教育和人才规律的工程式拔苗助长往往得不偿失。

再如，教育资源可通过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配置。市场机制虽然也会诱发短期行为，但如果高校被赋予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和运行机制，就不会不关注自己的教育质量和品牌，考虑到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市场机制常会支持长期行为；然而，行政资源配置往往因为政绩等因素更多关注短期行为。但毕竟公立教育具有公益事业性质，肩负着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培育的历史使命，国家自然需要大力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或资源配置绝大部分应该以一种基于学校性质、规模、使命而建立起来的科学、规范、透明的机制，而不是以各种名堂的工程来履行，从而使大家无须无休止揣摩下一阶段又会有什么新工程，也无须整天费心思地增强自己的谈判砝码或筹划某种策略去争取一些工程，更无须把大量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各种填表和“跑关系”的活动中。高校领导、老师便会静下来，集中精力研究和探索如何搞好教学和研究，高校也可以慢慢回归本质，不再简单追求一些表面的指标，而是沉浸在育人的修炼中、兴趣的探索中、重大科研或发现的激动中。这么做，也许一时一些显性的、意义不大的指标会有所回落，但我们会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出人才、震惊世界的科技创新或科学发现会不断涌现，那时我们再也不用成天把“钱学森之问”挂在嘴上。

以我们现行的科研管理为例具体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目前主要采取行政化的工程或项目配置机制，即使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块本应支持以兴趣为主的基础研究、维护

国家科学精神和文化的、孕育一批科学家的净土，也设法搞出了各式各样的“工程”。我国科研主力之一的高校，其科研管理体制采用的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国家到教育主管部门再到高校，层层管理，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是一级行政机构，有特定的行政级别。其次，高校科研活动组织方式行政化、工程化、甚至运动化，例如，当下不少高校及其主要研究力量就沉浸在“两个一流”的运动中。行政人员由于掌握着资源分配权而居于主动控制地位，充当评审和验收的角色，研究人员则为了申请项目而奔波忙碌，不断准备申请材料，按照行政人员不断变化的要求提交信息，行政人员的服务角色不复存在。再次，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激励政策行政化。目前我国科研评价中体现的是行政逻辑而不是学术逻辑，权力和官本位深深侵蚀学术界，造成了学术界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为政绩而重数量轻质量，很多学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没有含金量，而且重短期轻长期，项目评价以资助的行政级别论高低，论文评价则以期刊的检索情况为依据，而不是考虑研究本身的价值等等。可见行政机制取代学术机制主导科研管理问题很大，而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干预学术事务，根源在于行政权力掌握着学术资源的配置，而且配置方式失当。

再深入观察教育的资源配置，因教育特别是公立教育体系的公益性，全世界的很多大学都要靠政府的资金来维持运营，因此政府支持大学并不鲜见，但政府如何把资源配置到大学却有行政和市场（学术竞争）两种机制。

我们国家的资源配置是典型的行政主导模式，教育拨款从国家到大学，要通过国家或教育部设立的各种项目和工程来向财政部提出预算需求，然后再以项目和工程的名义把钱分拨到大学。如过去的“985”“211”和现在的“两个一流”，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进了笼子，就会得到大量的投资，因此大批大学和其主要力量倾尽全力，不惜包装和拼凑，设法带上“两个一流”的帽子。在这个过程中，部委的话语权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包括教育部门大家俗称的“跑部钱进”现象很常见。

很多西方的大学并不采用行政的机制，而是更加注重资源如何支持学术活动本身。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的公立大学也接受政府的拨款，但一般会通过一个拨款委员会来具体运作拨款事务，而拨款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高校、政府和业界的代表，能够基于多方的利益来确定拨款方案，达到多方满意和共赢。已有很多发达国家如何支持教育和进行资源配置的经验研究，这里无须赘述。

再深入剖析我们各类人才工程，不能发现其逻辑弱点。人才学和人类历史不断证明，杰出人才和重大科学发现大都是冒出来的，在可自由追随自己兴趣、能长期静心钻研的生态环境中，所有的苗子都有可能成为大才、对兴趣的执着追求可能孕育出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一个社会如果能构建这种良性的生态环境，伟大人物和重大的发明创造便会层出不穷。但我们目下的资源配置机制、教育科研评价体系、人才选拔工程虽然也可能浇灌出几棵苗甚或大树来，但却失去了大树成林的机会。各类人才工程的动议很好，笔者很荣幸也曾是早年“千百万人才工程”的一员，但对近年来日益遍地开花的各类工程选拔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类投机行为深感痛心，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不良后果不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更重要的是破坏教育和科研生态，值得决策层和各级政府认真反思和关注。

营造尊重教育和科学规律的生态系统，让杰出人才和科学创举冒出来

教育与科学本是一个系统和生态问题，生态首先强调共生，系统中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生态存在的前提，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自主的动态调整，主体关系的失衡或者个别主体的过度强势，必将破坏生态平衡，从而难以实现良性循环。其次，生态系统具有涌现性，当环境条件具备，就有可能通过自组织产生良性循环。

例如对于科学研究，我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冒出更多杰出人才和伟大的科学创举。我们国家钟情的颠覆性技术，如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3D 打印、物联网、页岩气开发等最新一代影响社会发展的新技术，大都是由苹果、谷歌等公司开发的，原创性的科技创新或设计并没有出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而且是全世界公认的“最聪明”民族之一的中国。从个体角度略加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其中的缘由。除了大学里主要精力在角逐那些工程、教育模式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教知识的模式外，社会的浮躁也阻碍着我们创新人才和成果的涌现，例如中国社会成功的观念太单一，扼杀了孩子们的兴趣和追求空间；长期应试教育抑制了年轻人的创造性；家长们对学生的过度溺爱和终生干预使得不少想猎奇、有想法和创意的青少年放弃了初心；全社会对短期财富的追逐挤压了那些对个人兴趣长期执着追求的空间等等。于是，很多颠覆性创新的机会只能留给像硅谷那样包容失败、可以在车库或地下室有一顿没一顿的创业者。另外，从机制上我们也可发现，曾经在 20 世纪主导诸如互联网、隐身技术、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GPS）、激光、无人系统等重大颠覆性技术开发的美国军方，也开始重视与硅谷的合作，注重更加灵活多元和市场化的方式，而不再仅仅依赖国家行政主导的大项目制。

综上所述，不加限制的工程和项目式的资源配置机制、政绩性的评价体系、工程性的人才选拔方式一定会导致包装、作秀、投机行为的泛滥，孕育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扭曲教育和科学的生态环境。那么，到底如何真正建立有利于教育和科学长期健康发展的资源配置体系？通过科学、规范、透明的机制营造尊重教育和科学规律的生态系统，以替代行政主导的以工程或项目为主的配置方式非常关键，例如以科学、规范、透明机制主导高教的资源配置，使高校静心于教育与科研主业，回归本质；建立质量与贡献导向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加强学术权力在高校资源分配中的决策权；为人才的成长和科学研究创造生态环境而非直接刺激和鼓励短期行为等。

（《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8日 13版 作者：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张晓军 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研究院副院长）

中医药高等教育特色发展路径何在？

“我们要引导中医药高等教育特色发展，必须更加重视尊重中医教育的知识传承与人才成长规律。”今天，在教育部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坦言，这也是为什么要将中医思维能力培养写入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总体目标。

把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经验上升为可复制的教育规律，必须依靠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兼任教育部中医药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的张伯礼介绍说，2007年，教指委成立当年接到教育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着手建立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历时5年时间试点检验，2012年12月，正式颁布了中医药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标准，提出了毕业生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和涉及中医专业办学关键环节的10项标准。

正是在这个标准中，首次提出中医思维概念，并把中医思维能力培养写入了总体目

标。各相关高校充分发挥中医药师承教育特点与优势，深入开展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实践了现代中医药师承教育新模式。

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创办“院校—师承—家传”相结合的中医教改实验班基础上，大力探索了长学制学历教育，先后创办“岐黄国医班”“时珍国药班”以及“卓越中医师”“卓越中药师”等诸多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了“更加人文、更加经典、更加实践、更加现代、更加国际”的新式人才分类培养目标。

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打破学院、学科、医院围墙，组建 50 余个示范性跨学科教学团队，在创新课程开发、教学学术研究、临床教学改革等方面予以重点突破，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教学瓶颈，推出了“前期厚基础能力、后期重跟师悟道”的阶梯式培养方案，切实做到“经典学习不断线、实践环节不断线、创新提升不断线”。

“从整体上来说，在中医传承班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环节、专业认证环节、加强实践、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环节，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以及推动中医药课堂设计、课程整合、师资培训、教师论坛、特色教材建设、中医经典分级考核、举办内经知识大赛、中医临床能力大赛等措施保障下，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确保了特色。”张伯礼表示。

中医药高等教育经过 60 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坦言，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突出问题，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将进一步加强医教协同，联合制定“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中医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

张大良介绍说，下一步改革将聚焦改革重点，突出中医药特色，将传承与创新并举。围绕“双一流”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制、优化中医药专业结构、夯实传统文化功底、强化实践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质量保障体系、扩大国际影响力、推进中医药信息化

建设等方面深化中医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证。

（《中国教育报》2016 年 10 月 27 日 记者：万玉凤）

发送范围：校领导、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甘肃中医药大学发展规划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东路 35 号

邮政编码：730000

网 址：<http://fgc.gszy.edu.cn>

邮 箱：fgc@gszy.edu.cn

办公地点：办公楼 218 室

联系电话：0931-8765565
